

论长城抗战

金以林

1933年的长城抗战，是自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中华民族抗日斗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态度和九一八事变时已有所不同：从最初的不抵抗，一味寄希望于国联调停，转向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派遣中央军的3个师投入作战。但它又显然不同于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是什么原因导致蒋介石在这时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态度而进行局部抵抗？为什么在抵抗了5个月后又同日军签订《塘沽协定》，以妥协告终？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迅速侵占我国东三省全境，并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但这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满足。当他们在东三省立足稍稳后，很快就把刀锋指向紧邻东三省并同西蒙和华北接壤的热河省。

热河省位于长城以北。日军如果占领热河，既可随时进窥西蒙和华北，又可巩固它在伪满的阵地。1933年1月，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议会发表演说，称：“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①内田康哉的这一演说公开表明了日本对热河的侵略野心。2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制订了对热河的进攻计划，称其目的“在于使热

^① 《内田康哉在日本第64次议会之外交演说》，《国闻周报》，第10卷第5期。

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国的基础”。^①2月17日，关东军发动了对热河的进攻。

热河的中国军队号称8万，似乎可以一战，但省主席汤玉麟在治理热河期间，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以充军饷为名，中饱私囊。热河省可用之兵实际上不过2万左右，其他部队并没有多少战斗力。他自己也承认：“看我热河的军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②九一八事变后，汤玉麟持首鼠两端态度，既派代表参加伪满洲国建国会议，又同张学良保持联系。日军向热河发动进攻的第二天，他同张学良联名发表通电，声称：“时急势迫，至此已极，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厉。”^③这自然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他的部下崔兴武、董福亭两旅早已秘密向日军投降，汤玉麟却仍委派他们分别驻守开鲁、朝阳前线。2月23日，关东军下达总攻击令后，董福亭不战而降，崔兴武只守一天便撤出阵地。日军于23日占领北票，24日夺取开鲁，25日侵入朝阳，27日分三路总攻热河，一路由开鲁攻赤峰，一路由绥中攻凌南，一路由要路沟攻凌源。^④3月3日，全部占领预定目标。汤玉麟佯称赴前线督战，暗地里征集卡车，满载鸦片，竟于4日放弃承德潜逃。日军仅以128名骑兵轻取承德。热河省大好河山10天内全部沦于敌手。3月9日，日军又对长城各口发动了进攻。

汤氏曾大吹大擂表示要坚守的热河竟如此轻易地丧失，全国舆论顿时哗然，同声谴责南京政府的军事外交政策，张学良更成众矢之的。3月7日，张学良不得不向国民政府电请辞职。身任南

^① 《关东军攻占热河计划》，日本参谋本部编《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6月版，第71页。

^② 赵毅：《热河失陷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4月版，第26页。

^③ 《张学良及汤玉麟通电抗日》，《申报》，1933年2月20日。

^④ 《申报》，1933年2月28日。

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3月6日被迫从江西“剿共”前线北上，并电国民政府称：“热河失守，悲愤填膺，中正决由赣即日北上部署一切。”^①3月10日，他批准张学良辞职，“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②，并抽调中央军3个师北上，参加抵抗。

为什么蒋介石这时不像九一八事变时那样完全不抵抗，而采取局部抵抗的方针呢？这有其深刻的背景。

热河的沦陷，特别是日军对平津的严重威胁，使人们认识到，日本侵略中国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第一步强占东北四省区，第二步侵入关内，再下一步就是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必须奋起自救。原西北军领袖冯玉祥通电呼吁：“暴日凭陵，日益危急，倘再不全力抵抗，则华北各省，随时可沦于日人之手。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③连蒋介石的许多嫡系将领也从“剿共”前线纷纷向蒋请缨抗战。一些地方实力派更是乘此指责蒋介石卖国，准备以此搞垮蒋介石。在国民党反蒋阵营中有着相当实力的西南政务委员会致电国民政府，强烈要求：“钧府迅速表示抗日之确切态度，对于前方御侮军队，尽先筹拨军实饷糈，以解国人之忧疑，正国际之视听。”此电威胁蒋介石道：“若犹执迷不悟，误国殃民，则西南方面惟有联合各省同志及全国民众共负此责，以期策进全国抗日之艰难事业。”^④即使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立法院长孙科、外交部长罗文干也主张抗日，反对对日妥协。为了缓和国内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情绪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蒋

-
- ① 《蒋介石为热河失守决即日北上部署一切致林森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台北，1981年9月初版，第631页。
- ② 《国民政府公报（第1077号）》，1933年3月13日，第12页。
- ③ 《冯玉祥致邹鲁论应速图抵抗暴日电》，赵遵三编《察哈尔抗日实录》，海军整书社，1934年版，第38页。
- ④ 《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电》，《大公报》，1933年1月18日。

介石不得不进行有限的抵抗，以此稳定自身的统治。

日军继侵占热河后，又向长城各口发动进攻，蒋介石及其政权无法断定日军是否准备向华北大举进攻。在蒋介石的眼中，华北和东北显然是有着不同的。他认为：“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不过从前是有名无实，而今则并丧其名。”^①而日军企图进犯在“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的华北地区，已超出蒋介石的忍耐限度，使他难以接受。东北沦陷的事实也证明，以绝对不抵抗方针求得对日妥协的政策是失败的。因此，蒋介石不得不重新调整对日政策，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故而他要对日进行有限的抵抗。

同时也应看到，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势力其实并未真正伸进华北。1928年北伐军进入平津后，华北处于阎锡山、冯玉祥的控制下。在1930年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张学良率东北军精锐入关，虽然帮助蒋介石击败了阎、冯联军，助了他一臂之力，但华北又落入张学良支配之下，张的实力因收编阎、冯余部而进一步得到扩充，成为蒋介石最大的潜在对手。因此，蒋介石也想利用长城抗战这一机会，使一部分中央军得以插足华北，以便一步步地把华北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热河抗战伊始，蒋便打算派遣中央军进驻华北，削弱张学良对华北的控制。宋子文在视察华北和热河时曾电请蒋介石“出二师为总预备队”。^②但蒋介石又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担心中央军这时北上会受到东北军的抵制，他宁可先让东北军去打头阵，以消耗东北军的实力，再伺机抽调一部分中央军北上；而且从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出发，他也不愿分散他在南方“围剿”共产党的兵力。所以他

① 蒋中正：《敌乎？友乎？》，《蒋总统言论汇编》卷四，正中书局，1956年10月版，第154页。

② 《宋子文自北平致蒋介石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第594页。

对宋子文的电报批复道：“中央部队如北上为预备恐友军多虑，以汉卿前属伯诚电中，如中央军不加入前不如不来之语，此果为何人之意，其电中并未详明，故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他仅表示：“如有必要，则可先派税警队北进也。”^①对张学良为热河危急要求筹定大计的电报，蒋介石竟这样批复：“成败存亡，听之而已。”^②热河抗战打响后，蒋介石只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等于2月28日以视察名义到北平。何应钦表面上似乎是作军政上的支援，其实是为取代张学良做准备的。3月7日，蒋介石抵石家庄，摸清东北军不会因张学良辞职而无法控制后，当天便派宋子文赴保定去看张学良，实际上是逼他辞职。张学良本是个很爽快的人，当即表示：“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申张纪律，振奋人心。”^③3月10日，蒋介石便明令批准张学良辞职，而以何应钦代之。张学良一去职，东北军军心立刻动摇。第二天，杨杰报告：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部“闻汉公去讯，退至平北附近”，“此后古北口防务，势非由中央军担负不可”。^④这时，蒋才顺势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投入到战场上，而这一行动正是在何应钦接替张学良成为华北军政首脑后才实行的。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清蒋介石对华北的盘算。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将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坚信国联对日本的暴行“必有适当之裁制”，对日仍主张“暂取逆来顺受态度”。^⑤但是，国联给予的仅仅是口头上的支持，这一点

① 《蒋介石对宋子文寒电的批复》，《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第595页。

② 《蒋介石对张学良为热边风云紧急请筹定大计电的批复》，《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第591页。

③ 王卓然，《日军侵热和张学良下野》，《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72页。

④ 《杨杰自北平报告张学良离平飞沪及敌在平收买军队情形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一），第621页。

⑤ 蒋中正，《一致奋起共救危亡》，《革命文献》，第35辑，台北，1978年10月，第7861、7862页。

连外国人也看得一清二楚。据1933年1月4日德国《德意志时报》载：“上十字架者非日本人乃华人，日本之无所顾忌，乃国联脆弱之态度所育成。李顿报告书中日本获得之便益，为一年前日方最热烈人士所梦想不到者。”^①日本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后，中国政府虽迅速向国联提出申诉，但是，美、英等国仍没有实际行动。2月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电告美国驻国联观察员，仅表示：“美国主张不承认‘满洲国’，但反对经济或武力制裁。”^②英国舆论则公开支持日本，称：“日本无论如何欲以武力占据满洲，吾人考虑满洲问题，不当问何者合理，何者不合理。”^③“日本为远东抵御赤化之柱石，英国无论如何，不致与其旧盟友为难。”^④前一段的实际教训，已使南京政府认识到：“最大的原因是自己本身不作抵抗之故”，“我们必要抵抗，然后方能引起国际注意”。^⑤也就是说：以前想以不抵抗为手段求得国际的支持，现在则是想进行一定的抵抗来求得国际的援助。这也是蒋介石在长城抗战期间进行了一定抵抗的原因之一。

二

当时，日本对华实行军事扩张的战略重点仍是长城以北的所谓满蒙地区。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各内阁，都不将九一八扩大到东北以外作为方针，并将‘满洲国’的建设，严定在长城以北”。^⑥但陆军中许多人认为：要确保对这个地区的统治，必须控制长城各口，并尽可能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一些侵华的激进分子更是跃跃欲试，力图不顾一切地把他们的侵略行动

① 《德意志时报》，1933年1月4日，《申报月刊》，第2卷第2号，第14页。

②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3年1至6月份，台北，1984年12月版，第151页。

③ 《泰晤士报》，1933年1月13日，《申报月刊》，第2卷第2号，第15页。

④ 《每日电闻》，1933年1月4日，《申报月刊》，第2卷第2号，第15页。

⑤ 汪兆铭：《悲壮抗敌以求我民族生存》，《革命文献》，第36辑，第8246、8247页。

⑥ 重光葵：《日本之动乱》，南风出版社，1954年3月初版，第64页。

伸入关内。这样便使长城一带的局势日趋紧张。

日本关东军侵吞热河之前，于1933年元旦就对山海关发动了进攻。日军参战部队除山海关原驻部队及伪警外，又由辽宁绥中增援“步兵2000余人，大炮20余门，日机8架，铁甲车3列”。^①当时，中国驻守山海关的部队只有“不足一团的兵力（实际只有两个营）”^②，中国军队虽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山海关。这个事件，成为长城抗战的发端。

日军侵入热河时，关东军使用的主力是第八师团和第六师团。日军夺取承德后，便决定迅速夺取长城各口。于是，第八师团主力继续向南推进，先后对古北口、喜峰口等长城重要关口发起攻击。

中国军队当时担任长城一线正面防务的部队主要有东北军王以哲、万福麟、何柱国的3个军，晋军商震部，西北军宋哲元部和中央军徐廷瑶部等。这几支部队的实际状况有所不同：战斗力较强的是宋哲元、徐廷瑶两部，其他部队都比较弱。

东北军本来是有相当战斗力的。但九一八事变中未作抵抗便仓皇撤入关内，士气受到很大打击，热河兵败后，军心更加涣散。再加上张学良被迫下野，使东北军突然失去了领袖，人心惶惶，已经无心作战。因此，东北军在长城抗战中并没有较好的战绩。

晋军商震部的战斗力本来是比较弱的。北平军分会派给晋军的任务是驻防冷口一带正面约百余里防线，而商震只派了一个师，“其余的两个师和军部直属部队都布置在远远的后方开平”，“所谓准备也不过是加强工事，把炮兵推进到冷口外面，准备支援前进阵地，但又不敢推进过远”。实际上是摆个架子，“指望日本人适可而止，占了热河不再向冀东进展”。^③这样的军队，

① 《张学良致罗文干电》，《革命文献》第38辑，第8739页。

② 何柱国：《山海关防御战》，《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410页。

③ 石彦魁：《冷口的失陷》，《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73、474页。

其战斗力是可想而知的。

西北军宋哲元部，有较强的战斗力。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率领的西北军基本上解体。余部经张学良批准，改编为第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由于西北军有刻苦训练的传统，不到两年的时间，宋哲元便把一支残破的军队练得很有起色。孔祥熙视察二十九军后所得的印象是：“卒伍整饬，无矜气，无怠容。”^①“同时，西北军练兵，一向以日本为假想敌，所以当第二十九军奉命开赴平东防御日军的时候，全军士气异常旺盛。”^②

中央军的3个师从武器装备上讲，比其他部队都要精良，军队素质也比其他部队要高。该军的一些主要将领如关麟征、黄杰、刘戡、杜聿明、郑洞国等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有较强烈的民族意识。“就是一向热心‘剿共’的徐廷瑶，本来奉命到江西上饶担任赣东北清剿指挥的任务，也请求北上抗日。”^③当他们开赴长城前线后，在全国人民抗战呼声的鼓舞下，全军将士同仇敌忾，摩拳擦掌，誓愿效命疆场。

长城抗战开始后，驻防古北口一带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在日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企图固守古北口，等待中央军徐廷瑶部的增援。但徐廷瑶军先头部队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在3月10日夜到达古北口时，王以哲部已被日军击败，并在11日把古北口关口丢了。关率所部力图夺回古北口，但未能达到目的，只得据守南天门阵地。接着，黄杰所部第二师开到，古北口方面一时形成敌我对峙的局面。

担任喜峰口一带防御的东北军万福麟部溃不成军，纷纷逃向关口。9日，日军攻占喜峰口第一道关门。前来增援的西北军宋

① 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9月版，第20页。

② 何基洋：《29军在喜峰口的抗战》，《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47页。

③ 杜聿明、郑洞国、覃异之：《古北口抗战纪实》，《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84页。

哲元部先头部队在当天黄昏到达喜峰口。宋部“装备差，火力弱，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6枚”。^①但军队的士气很高。宋部冯治安师于10日夜乘敌不备进行偷袭，黑夜里不用火器攻击，而用大刀砍杀，用刺刀混战。由于两军的士兵白刃相接，距离很近，因而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使用。这场夜战杀死杀伤不少日军，把喜峰口夺了回来。这是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捷报传来，大大振奋了全国人心。当天津《益世报》甚至称：“喜峰口这次胜仗，我们叨这班英雄的光，又抬起头来了，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②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威名几乎家喻户晓。日军遭到这次意外的挫折后，重新部署进攻，但未得手。喜峰口方面也形成对峙的状态。

冷口防务原由东北军缪澂流师担任，后来又增派晋军商震部，而晋军战斗力较差。这样，冷口防务便成了长城防线上最薄弱的一环。

日军在古北口和喜峰口两处的进攻受挫后，便把驻守热河北部的第六师团调到长城一线，并选择冷口作为主攻目标，于4月9日发动全力进攻，冷口遂告失陷。日军突破这个缺口后，立刻向纵深扩展，分兵占领滦河上游的迁安，威胁滦河西岸守军阵地侧背，主力则绕到喜峰口后面，对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军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二十九军腹背受敌，不得不转移阵地，随即撤至通州以东沿运河布防。

这样，日军已基本上占领长城一线的主要关口。但是，仅以两个师团为基干的关东军，面对数倍于己的中国军队的抵抗，无法确保对长城一线的控制。于是关东军改变“不要在河北省内实施作战行动”的原定部署^③，在4月11日下令：“本军以不使敌人停留于滦东地区为目的，并配合宣传及其他各种工作，急追敌人，予

① 董升堂：《夜袭喜峰口敌后》，《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第453页。

② 《喜峰口的英雄》，《益世报》1933年3月19日。

③ 《关东军攻占热河计划》，《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第71页。

以铁锤的打击。”^①这样，战争便超出了长城的范围，扩展到河北平原。

但是，4月19日，日军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下令：“在滦东地区作战的部队，迅速撤回长城线。”^②根据以上命令，日军自21日逐次返回长城一线。日军在战事相对顺利的情况下之所以突然撤兵，是由于日本天皇直接干预了关东军的行动。因为越过长城侵入华北，毕竟不符日本政府原定的战略意图，他们担心这时向华北扩展军事势力会损害英美在华利益，引起国际纠纷。关东军出兵热河的原计划规定不犯河北，关东军未经向天皇奏准便擅自越过长城进犯滦东，这有违于天皇的意旨。关东军被迫屈从天皇的御旨，只好中止了滦东的军事行动。

关东军虽然停止了军事进攻，但是他们的板垣特务机关却以“不要上中国缓兵之计的当”为理由反对停战。在北平的永津武官也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要求必须使中国军队向密云以南撤退。这时，中国军队在日军撤退后于4月23日夜开始反击，先后收复安山、卢龙、迁安、昌黎、抚宁。30日，一直推进到北戴河。^③这使骄横不可一世的关东军觉得难堪。在这一背景下，关东军决定再次进入滦东地区。为了摸清政府的底数，小矶参谋长特意去东京活动。荒木陆军大臣认为：“扩大与不扩大要对时间、地理、兵力三方面进行考虑，如时间能缩短，地域和兵力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④于是，小矶参谋长便同陆军部重新制订了“沿长城线作战”，“迫和为主，内变策

① 《关东军作战命令第495号》，《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机密作战日志摘要》，《革命文献》，第38辑，第8917页。

② 《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98页。

③ 《五十三军出击滦东经过概要》，《榆关抗日战史》附录，中国国际出版社，1943年初版，第123页。

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大本营陆军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225页。

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并奏请天皇予以认可。^①

经过这样一番幕后活动，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5月3日下达命令：“决续予敌以铁锤的打击，以挫其挑战的意志。”^②

古北口方面是日军这次进攻的重点。他们的具体部署是：“第八师团应将主力向密云一带集结，保持对北平方面施以强压的态度。”^③自古北口失守后，中国军队一直坚守南天门。南天门地形险要，不能使用很大的兵力。日军全力进攻，战斗十分激烈。中央军的3个师先后均受重创，被迫全线后撤。当中央军退到密云时，当地是一抹平原，既无险要的地形，部队又都已受创，难以作有效抵抗。何应钦急调傅作义部第五十九军开往昌平集结，后向怀柔、顺义出击。但因作战不利，又退守顺义、怀柔以北山地。向滦东进犯的日军第六师团进展更为迅速。到22日，日军已进至三河附近，并逼近通州、香河，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故都北平已无险可守，危在旦夕。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积极着手谋求直接同关东军签订城下之盟。

三

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局部抵抗的同时，也在秘密谋求通过交涉达成对日妥协。早在4月中旬，中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就已开始。19日，黄郛便在上海与日本驻沪代办根本博进行了会谈。5月3日，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设立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指派黄郛为委员长，“其主要目的实系：对外缓和日本，对内绥靖反侧。”^④

就在黄郛上任的当天，关东军再次发动了对滦东的大规模进攻。不到20天时间，日军前锋已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日本

① 梁敬𬭚：《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台北，《传记文学》，第10卷第5期，第15页。

② 《关东军作战命令第503号》，《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机密作战日志摘要》，《革命文献》，第38辑，第8929页。

③ 《关东军作战命令第510号》，《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第104页。

④ 沈亦云：《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443页。

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前方的中国军队不断败退，根本无法收容整理。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仍留在南方“剿共”，后方几乎没有可增援的部队。“前线支持已不能以日计，而以时计，宋哲元将军言其兵在喜峰口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则如绵羊，驱之不动。”^①何应钦甚至打算以军情太紧急，来不及请示为由，将军政机关撤出北平。黄郛也向蒋表示：“既往工作，尽付流水……现在北平既入战区，政整会自无工作余地……拟随军事机关转进或南旋。”^②

局势的发展瞬息数变。正当何应钦等打算放弃北平准备南撤的当天，日本驻华代办中山祥一却主动找到何应钦表示：如果中方来人言和可以接受。何应钦本已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突然出现这样一个“转机”，真是喜出望外，当即向中山表示可与黄郛联系。至此，中日直接交涉终于正式开始。

在此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不愿同日方直接进行正式谈判，而把希望寄托于国联的调停，实际上就是希望英、美能出面干涉。山海关失陷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外交部即对外发表宣言称：

“中国政府认为国联应迅即以最有效之方法予以制裁，同时中国军队仍当尽其力量，抵抗日军之暴行。”^③其实，所谓“当尽其力量抵抗日军之暴行”，并没有真正做到，宣言的重点仍是希望国联能够出面对日本侵略“予以制裁”。

随着战事的发展，蒋介石更加急迫地期望英、美出面干预。但由于英、美一向默认日本在“满蒙”地区的所谓特殊利益，对日本在热河的行动仍采取坐视态度，所以对国民政府的要求并没有作出积极反应。蒋介石没有就此死心，当日军越过长城一线继续南侵的时候，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仍对英使称：“除非各国明白

① 沈亦云：《亦云回忆》，第471页。

② 《黄郛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亦云回忆》，第486页。

③ 《外交部为日军发动榆关事变对中外宣言》，《中央日报》，1933年1月6日。

表示不能履行应尽之义务外，中国不变其政策。”^①宋子文在访美期间，曾于5月中旬会晤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项白克，提议由美国调停长城一带的中日战事。项氏照例敷衍之后条陈国务院，认为：“英国前些时曾尝试斡旋，不久即宣告放弃，可见对于此事美国也不宜充作调人。”^②

利用国际交涉以协助解决中日冲突的希望，至此可说完全破灭，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寻求对日直接交涉。

在中国军队已陷于危境，准备放弃北平的时候，关东军为什么主动提出停战议和，使局势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转折呢？

首先，日本这个阶段的侵华重点仍在所谓“满蒙”。当时，伪满洲国刚刚建立，立足未稳，关东军短期内又吞并了热河省大片土地，消化这些“战利品”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因此，关东军也迫切希望在作战形势最为顺利的情况下，“应不失时机，迅速签订有关协定，在华北作战军队大部迅速退回至满洲国……绝对避免为等待其成就，而迁延停战协定，长久使关东军处于目前的状况”。^③关东军对华北、特别是长城一线发动进攻的主要目的，此时还只是在这里建立起一个缓冲地带，作为巩固它对东北四省区统治的屏障。当这方面的目的达到以后，便可以暂时收缩力量，以免把战线拉得太长。同时，就其本身实力而言，关东军发动更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尚未就绪，而且在长城抗战期间，遭到中国军队的奋勇抵抗，损失也相当惨重，需要休整补充。如果此时立刻攻下平津，中日关系有可能全面破裂。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它还没有足够把握加以应付。

第二，华北各省和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有所不同。如果日本立刻侵占华北各省，它不能不担心欧美列强作出反应。5月19日，当北平局势日趋危急时，中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和美国总统

① 沈亦云：《亦云回忆》，第455页。

②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3年1至6月份，第835页。

③ 《塘沽停战协定的成立》，〔日〕《现代史资料》7，第517页。

罗斯福发表联合公报宣称：远东之严重发展，“在过去两年中扰乱世界之和平，使两大国军队从事破坏性质之敌对行动。余辈深信此种敌对行动，当可立即停止”。^①连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也宣称：“日本控制中国，将为世界和平最大之祸患，宜加限制。”^②这使日本政府感到只能适可而止，表示：“日本在满洲应办之事已多，故对平津决无侵入之意，平津外人关系至密，且秦皇岛一带有英国利益关系，异常复杂，日本纵得平津，无论就何方面均无益处”。^③日本显然担心，万一欧美列强基于自身利益出面干预，它势将陷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第三，日军在进攻热河的同时，还制定了一项策动华北内变的阴谋，就是妄图扶植一些北洋军阀时期的旧军人、旧官僚作为代理人，策进华北“独立”活动，企图在华北制造亲日政权，使华北摆脱南京控制，实际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一阴谋由天津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负责实施，与关东军军事行动配合。但是，板垣对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等进行策反都没有成功。尤其令板垣失望的是，他寄以很大希望的张敬尧于5月8日在北平六国饭店被刺杀。板垣不得不向关东军承认策动内乱有困难：“一、华北反蒋部队缺乏统一号令之中心人物；二、反蒋派内容复杂，合流不易；三、反蒋派不必即是亲日派，更不必即是亲满派；四、南京中央政府之威权，尚未丧失，反抗中央，仍多顾虑。”^④至此，板垣的这个阴谋亦已完全失败。

第四，面对中国军队的抵抗，日军感到：“蒋介石对日之不即妥协，实因受西南及反对派之牵制，倘使对日立即妥协，必致

① 《罗斯福、宋子文发表共同宣言》，《申报》，1933年5月21日。

② 梁敬𬭚：《华北停战秘幕与塘沽协定真相》，《传记文学》，第10卷 第6期，第20页。

③ 《刘崇杰与日本驻华公使馆参赞上村谈话记录》，《革命文献》，第38辑，第8812页。

④ 《天津特务机关致关东军参谋长》（天特272号），〔日〕《现代史资料》7，第553页。

促成反蒋运动具体化。就此形势观察，倘我对蒋之苦衷不谅解，则必演成蒋之容共，出全国力以对日。”^①与其这样，不如先在华北逐步建立一个亲日政权。黄郛主持的政务整理委员会虽不完全符合日本的愿望，但黄郛是亲日派，黄所网罗的政整合会人员中如殷同、殷汝耕、李择一等，都是当时所谓的日本通。如果能够利用黄郛，那么日本便能不动声色地渗入华北，而且不容易引起欧美列强的干预。

基于上述理由，日军于5月22日夜密邀黄郛到日本大使馆进行会晤，双方谈判至23日凌晨。黄郛在南京政府划定的“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②的范围内，与日方达成4项停战协议。当天下午，即由何应钦答复日代办，对其所提4项条件完全接受。5月30日，中国全权代表熊斌在白河口的塘沽与日军进行正式停战谈判。他在日方提出的原案不许改动一字的情况下签了字，并立即生效。

综观长城抗战、蒋介石政权所以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其决定的因素仍是它一贯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虽然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南京政府改变了九一八事变时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但“消极抵抗，积极谋和”依然是南京政府指导长城抗战的根本方针。其基点仍是求得对日妥协，抵抗也只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的条件下达成的妥协。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塘沽协定》的签订。

《塘沽协定》的签订，暂时结束了自山海关抵抗以来长达5个月的长城抗战。然而，日军从此在长城各口设置了有利据点，并在长城以南的冀东和平北的辽阔地带建立起了一个“缓冲地域”，迫使中国军队“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亦不得有挑衅扰乱之

① 《蒋介石致何应钦、黄郛电》，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1月，第567页。（引语为蒋介石转告何应钦、黄郛获知的日军情报。）

② 《汪精卫致黄郛来电》，《亦云回忆》，第479页。

行为”。^①这样，华北的门户已经洞开，一旦时机成熟，日军便随时可以直取平津了。

四

长城抗战是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重要战役。国民党政府在这次战役中多少改变了九一八以来在北方不抵抗的政策。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的战斗中曾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但这时不同于七七事变后实行全民族抗战，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错误方针指导下，最后仍以被迫签订《塘沽协定》而告失败。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比起不抵抗政策来虽有变化，但从根本上说，仍是贯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的。蒋介石曾公开宣称：“我们应当坚确认定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要先剿匪。”^②面对全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呼声，蒋介石竟严令：“如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③汪精卫在停战的当天也发表书面谈话称：“人谓昔以不抵抗而失地，今以抵抗而失地，此言诚然。苟一度量现有国力，则抵抗之不能得到胜利，固自始而知之，知之而犹抵抗，亦惟尽其力之所能至，以行其心所安耳。”^④

那么，国民党政府此时是否真象他们所说的“度量现有国力”、“尽其力之所能至”进行抵抗呢？1933年2月，正当热河战事爆发之时，作为最高军事长官的蒋介石不但没有北上抗日，

① 《塘沽协定》，《大公报》，1933年6月1日。

② 蒋中正：《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蒋总统言论汇编》卷十，第174页。

③ 《蒋介石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三），第36页。

④ 《汪精卫为停战交涉事书面谈话》，《革命文献》，第38辑，第8899页。

反而跑到南昌，集中5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其中担任主力的就有陈诚所率领的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嫡系部队12个师约16万人，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的侵略，蒋介石仅仅派了中央军徐廷瑶部3个师北上抗日。这难道能说是“当尽其力量，抵抗日军之暴行”？

1933年5月10日，北平局势日益吃紧时，蒋介石仍命令南方8省总动员“清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军队。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对路透社记者称：“为保持满洲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占张家口之必要。”^①把战火燃向西蒙的察、绥两省，这是日军在攻占热河后的既定目标。5月24日，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发动南侵，并进占沽源，察省形势危急。为了抵抗日军的侵犯，5月26日冯玉祥将军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号召全国军民抗日。抗日同盟军“一无饷源，二无弹药，竟能一举号召十余万众，在三星期的短时间内，以1600余官兵血肉代价，击走日伪军数万，收复察东几千里失地”。^②蒋介石政权对这支抗日民众武装不但不给予起码的援助，反而多方破坏，污蔑冯玉祥是“假名抗日，实行内争”，“勾结苏联，容纳共党”^③，并以军事相威胁，把被迫从长城线上撤出的军队迅速派往察哈尔，“准备向张家口进攻的兵力计有16个师、两队战斗机和8列钢甲车”。^④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在内外夹攻下，被迫解散。蒋介石为何要如此破坏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主要是害怕冯对日积极抵抗，将招致日军以妨害停战协定为名继续进犯，从而分散他“剿共”的力量。对此，《大公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对外尽可抹煞，对内

① 《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为平津局势对路透社记者谈话》，《大公报》，1933年5月23日。

② 冯玉祥：《察哈尔抗日实录》序，赵谨三编：《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页。

③ 《反蒋运动史》，中国青年军人社，1934年10月版，第599页。

④ 高树勋、张允荣、邓哲熙：《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第126页。

之爭必爭。”^①這一切難道也能說長城抗戰是“盡其力之所能至”嗎？

馮玉祥當時對蔣介石的反動政策曾直言不諱地指出：“握政府之大權者，以不抵抗而棄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熱河，以不徹底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滬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戰事而言，全國陸軍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軍則根本未出動；全國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②可見，1933年前後蔣介石政府的對日政策不管是抵抗還是不抵抗，交涉還是不交涉，其實質仍是为了求得對日妥協，以達到它們集中力量“剿共”的首要目標，這就是蔣介石所堅持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因此，長城抗戰中，儘管許多中國軍隊，包括一部分中央軍將士在內，進行了浴血奮戰，結局仍然是以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而告終。

（作者單位：北京市《學習與研究》杂志社）

① 《大公報》，1933年7月9日。

② 《馮玉祥就任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通電》，《國聞周報》，第10卷第22期。